

學術對談

## 對話陳力丹：馬克思主義新聞學

對談人：陳力丹、黃煜、廖雪婷

文稿整理：陳聰



陳力丹教授  
(Prof. Lidan Chen)

「馬克思、恩格斯有這樣一個基本思想：『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一個國家的報刊、輿論組織會受到統治階級思想較大影響，但它們傳播的思想不能簡單的認為就是或只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兩者不完全是一回事。他們對這個論斷進行了一系列的具體論證。如果我們忘記了或不知道這些論證，用這個宏觀的論斷簡單地套用，說明各種具體的歷史與現實，就可能得出荒謬的結論。」

---

黃煜，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教授。研究興趣：新聞與媒體表現、傳播政治經濟學。電郵：s03033@hkbu.edu.hk

廖雪婷，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研究興趣：數字媒體、性別與勞工研究、全球化、東亞流行文化。電郵：saraliao@cuhk.edu.hk

---

Dialogue

## Dialogue on Marxism Journalism

Discussants: Lidan CHEN, Yu HUANG, Sara LIAO

---

### Abstract

Professor Chen Lidan shared his insights on controversies about Marxist thoughts on press, news and communication. He also explained how later Lenin and Stalin interpreted the roles of press in contrast to Marx's thoughts.

Chen clarified some of the debatable views on Marx's ideas on press. It is Chen's belief that Karl Marx had never denied his thoughts on press and there is no dichotomy between "young Marx" and "mature Marx." Marx's thoughts on press was a slowly-developing process; rather than denying "young Marx," "mature Marx" enriched it.

Marx, as Chen suggested, in a certain sense, considered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s carriers of public opinions and providers of information in a commercial society, but at the same time, Marx assumed that such media could not enjoy complete independence and would be affected by a variety of interests including political parties and commercial interests. Chen asserted that Marx didn't think press was a definite subordinate to the party, neither was the party press.

---

Yu HUANG (Professor).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journalism and media performance, political economy in communication.

Sara LIAO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arch interests: digital media, gender and labor studies, globalization, and East Asia popular culture.

### *Dialogue on Marxism Journalism*

Chen frankly pointed ou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Marxist media thoughts has been slow in mainland China. The academic research has been politicized, 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research must be consistent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e reminded the researcher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n Marxist thoughts on press, news and communication that they must conduct 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facts and first-hand materials.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Chen, L., Huang, Y., & Liao, S. (2019). Dialogue on Marxism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 Society*, 50, 1–26.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0期(2019)

## 陳力丹簡介

陳力丹是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國際新聞界》主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等職。其研究方向為新聞理論、外國新聞傳播史、中國新聞傳播史、傳播學理論和輿論學。陳力丹教授自1979年以來發表研究成果800多萬字，其中獨編/著及第一署名著作52本、論文200多篇、一般文章1,900多篇。根據2010年〈中國新聞傳播學被其他學科引證狀況及其分析〉一文，陳力丹論文發表量、引證數和被外學科引證數，均居新聞傳播學刊第一位。

**廖：** 陳老師您好！謝謝您接受我們的訪談。當年我在上大學唸新聞史的時候第一次接觸到您的關於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講解和著作，也第一次得知您多年來一直從事相關的研究。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

**陳：** 我讀馬克思、恩格斯的書，始於1970年，時年19歲。當時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被派到富錦縣外調，在縣城的新華書店看到一本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單行本，只剩一本，書脊破損，我買了下來。那時除了毛澤東著作，我幾乎看不到其他書。恩格斯引證黑格爾的一段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這是一次壯麗的日出。一切能思維的生物都歡慶這個時代的來臨。這時籠罩著一種高尚的熱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種精神的熱忱，彷彿第一次達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諧。」1971年以後，在「批陳（陳伯達）運動」中，毛澤東要求「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我通讀並輔導別人學習了馬列的六本書和其他很多馬列著作。

我研究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與實踐開始於1975年，那時我是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的「工農兵學員」。那年春天毛澤東號召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負責具體操作的是張春橋。我把《馬恩全集》和《列寧全集》掃了一遍，重點看了馬恩在《新萊茵報》上的文章，以及列寧在《火星報》上發表的文章。我負責寫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新聞實踐與思想〉，當時寫了40,000字。經過徐國

興老師的修改刪節，定稿24,000字，後來成為北大新聞專業編的鉛印本《新聞理論講話》的第一章。那是我第一次從新聞傳播角度接觸馬克思主義關於新聞傳播的思想，但社會氛圍很糟糕，受「四人幫」的影響，鬥爭、批判的詞句較多。

1978年我成為第一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系研究生。改革開放的形勢使我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從那時我確立了自己的信念，並為之奮鬥了一生。這就是要實現社會主義的民主、自由和法治。我的導師是溫濟澤老師。他是人民廣播事業的創始人之一，當時是社科院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他要求我們學習馬克思、恩格斯的新聞思想。我作為他的研究生，正式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了。當時確認研究的內容是，從《萊茵報》到《新萊茵報》。後來寫畢業論文，感覺無法完成對馬恩這八年思想的研究，最後決定寫開頭的部分，即只研究《萊茵報》時期。就這樣，我逐漸接觸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新聞傳播思想。1979年發表〈最後一期《新萊茵報》〉，1980年發表〈談談馬克思《萊茵報》時期的報刊思想〉。

1982年4-5月間施拉姆(Wilbur Schramm)訪華，同年11月23-25日在中國社科院新聞所召開了我國第一次傳播學研討會。我參加了那次會議，會上我談到馬克思也有傳播思想，不少與會者都想知道，我說我正在寫一份材料，但到會議開始還未做完，題目是〈從傳聞女神到印刷所廣場——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思想〉，「傳聞女神」是古希臘、古羅馬神話裡的一個小神，「印刷所廣場」指《泰晤士報》編輯部所在地。會後我完成一份油印的資料性文章，約兩萬字，分頭寄給了與會者。這是我研究馬克思早期情況。

我的研究生畢業論文，最後確定的標題是《馬克思〈萊茵報〉時期的報刊思想及其歷史地位》，這篇文章是我們這屆80多位同學裡最長的，74,000字。現在此文正在出版中，除了錯別字和錯誤的標點改一下，註釋和引文方式均不變動，保留當時的原樣。

廖：您上世紀90年代的著作裡面有一本《精神交往論》，討論的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念。具體來說，他們有著怎樣的新聞傳播觀念？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0期（2019）

陳：我1981年細讀《德意志意識形態》，發現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一個與傳播相關的德文概念「Verkehr」，中譯文是「交往」。在這個概念的基礎上，他們進一步提出了「精神交往」（geistiger Verkehr）和「世界交往」（Weltverkehr）。19世紀的工業革命和交通革命造成了全球化的交往，於是他們使用了「世界交往」的概念。1982年我為第一次傳播學會議代表們提供的資料性文章〈從傳聞女神到印刷所廣場〉，對此首次進行了論證。1993年在《精神交往論》裡比較詳盡地討論了他們的這一思想。馬克思使用法文寫信時，特別對這個詞作了說明，寫道：「我在這裡使用『commerce』一詞是就它的最廣泛的意義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詞那樣。」馬克思使用英文寫作時，「Verkehr」的對應詞是「intercourse」。根據德文「Weltverkehr」，「世界交往」的對應英文應該是「world intercourse」。他們關於交往的論述，不僅是物質意義上的，同時也是在宏觀上論證精神交往，以及這種交往與物質活動的關係。例如他們寫道：「commerce、Verkehr等等，所有這些字眼既意味著商業關係，也意味著作為個人自身的特性和相互關係。」「Verkehr」這個詞包含了所有物物交換（背後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人的精神交往，還包含男女之間的性愛關係。我以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交往」作為一個很大的背景來研究他們的傳播思想，他們的思路非常開闊。

我們一般講到傳播（communication），是指信息的傳播。馬恩把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交往視為一種人群與人群之間的交往。馬克思認為，人類歷史上有兩種基本的交往方式，一種是貿易，一種是戰爭。戰爭雖然很殘酷，但確實是實現人類內部交往的重要路徑。恩格斯談到民族與民族交往時，列舉了一個典型的例子，即美墨戰爭。戰爭的結局是墨西哥的加利福利亞等地成為美國的領土。恩格斯就此使用了兩個詞形容，一個是「毫無作為的墨西哥人」，一個是「精力充沛的美國佬」。他反問：「如果精力充沛的美國佬迅速地開發那裡的金沙礦床，增加流通手段，在短時間內在太平洋沿岸最適宜的地方集中稠密的人口，開展廣泛的貿易，建立許多大城市，開闢輪船交通，鋪設從紐約到舊金山的鐵路，

第一次使太平洋真正接觸現代文明，在歷史上第三次為世界貿易開闢新的方向，那有什麼不好呢？」他認為這是一個進步。此後200年的歷史證實了恩格斯的觀點。馬恩的交往觀不是簡單地站在某一民族的立場上，而是客觀地考察這種交往對擴大人類內部的交流和人類的整體發展是否有利。他們的交往觀比較宏觀，思想比較深刻。

**黃：**馬克思《萊茵報》時期對於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讚美，其中心思想是倡導及要求保障言論自由的。對於這點怎麼看？我們知道歷來有兩種解釋，一是用青年馬克思和成年馬克思做一個切割。還有一種理解認為馬克思並沒有改變過什麼，只是後期他把精力放在研究《資本論》上，很少再涉及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議題，但是對報刊思想、媒介思想、新聞自由等等這些闡述沒有改變過。就這兩種觀點，想聽聽你的意見。

**陳：**馬克思和恩格斯走上社會的時候，經濟生存都沒有問題，他們遇到的主要是精神生存的不自由。所以馬克思1842年2月寫的第一篇政論〈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用古羅馬塔西佗的話作為結束：「當你能夠感覺你願意感覺的東西，能夠說出你所感覺到的東西的時候，這是非常幸福的時候。」2012年10月央視《新聞聯播》曾有一次關於「你幸福嗎？」的採訪，我當時就閃過一個念頭，如果問我，我會用馬克思引用的這句話回覆記者。馬克思寫的第二篇政論（1842年4月）是〈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關於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級會議記錄的辯論〉，繼續討論言論出版自由問題，他用了古希臘斯培爾泰阿斯和布利斯回答波斯總督希達爾奈斯的一句話作為結束：「自由的滋味你卻一次也沒有嚐過，所以你就不知道它是否甘美。因為只要你嚐過它的滋味你就會勸我們不僅用矛頭而且要用斧子去為它戰鬥了。」這是馬克思面對普魯士王權扼殺言論出版自由第一聲吶喊，用有力的邏輯論證歷數書報檢查制度的罪惡，以清晰的法治思維闡發了他的言論出版自由的思想。

當時德國著名的學術日刊《德國年鑒》主編盧格，每天審閱各種學術論文都有些審美疲勞了，看到馬克思的文章後眼睛一亮，在刊物上公開做出了這樣的評價：「從來還沒有人說出，甚至也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0期（2019）

不可能說出任何比這些文章更加深刻、更加論據充足的意見來。我們真應該為這種完善、這種天才、這種善於把那些依然經常出現於我們議論中的混亂概念整理得清清楚楚的能力感到慶幸。」「在談到將來的出版自由的地方，這種基礎至少根據他的原則才值得了解和作為依據。」馬克思這兩篇關於言論出版自由論著的分量，是可以與彌爾頓當年的論證媲美的。

關於青年馬克思和老年馬克思，這只是20世紀60年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裡的一部分人（法國結構主義），以馬克思《1844年手稿》劃線的一種說法；2018年又有一位叫史博德的老外，說「1850年後，馬克思本人成了一個反馬克思主義者」。這方面的討論均集中於馬克思主義總體論層面，前者還有一些歷史材料可以拿來討論；後者由於被中國某網媒報道而一度引人注目，但是一個偽命題。馬克思確實說過，我只知道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是有具體背景的。這位老外以1850年劃線毫無根據，他僅提及兩本馬克思著作（1871年的《法蘭西內戰》和1867年《資本論》），說的大部分話均無引文依據，基本是信口胡說。隨後，被幾位研究馬克思的專家所駁斥。以上在宏觀上討論馬克思的總體思想，均沒有涉及馬克思《萊茵報》時期的報刊思想的評價，這方面所謂青年馬克思和老年馬克思只是「中國特色」的說法。

我在1980年發表那篇關於《萊茵報》的文章後，曾有一位新聞學教授不點名地批評我：「他們所推崇的馬克思，不是寫作《共產黨宣言》、《資本論》、《法蘭西內戰》的馬克思，而是主編《萊茵報》時期的馬克思的青年時代……對於共產主義戰士的馬克思卻無端地加以貶低。」作者還談到西方青年馬克思熱如何使「某些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發生思想動搖」，「這倒是一面鏡子，很值得我們警惕」。

對此，我在1981年的畢業論文裡專門有一章討論這個問題，標題是「馬克思報刊思想發展的連續性」，第一個小標題是「八例證明」，涉及《萊茵報》之後從1844年到1892年的材料，證明馬克思報刊思想的連續性。由於畢業論文沒有公開發表，我於1982年6月發表文章〈關於青年馬克思和老年馬克思報刊思想的幾個



問題〉，回應了這位教授。文章先說明他借用了「西馬（西方馬克思）」青年馬克思和老年馬克思的說法，但人家談的是《1844年手稿》而不是《萊茵報》時期的報刊思想。我指出，馬克思從未否定過他在《萊茵報》時期的報刊思想。1851年，他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戰友「紅色貝克爾」出版了經他審定的《馬克思文集》第1卷，收錄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第二篇文章是〈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關於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級會議記錄的辯論〉。如果馬克思認為他在《萊茵報》時期的論著是不值一提的，會積極出版自己的文集嗎？恩格斯逝世前最後做的一件事，就是整理出版馬克思《萊茵報》時期發表的論著，還把以上兩篇論著的標題寫到長長的書名裡，署名「恩格斯編」。如果恩格斯否定馬克思早期的報刊思想，他會在自己生命的最後時刻出版馬克思《萊茵報》時期的論著嗎？我認為不存在什麼青年馬克思、老年馬克思，馬克思的思想是一個緩慢的發展過程，沒有後者否定前者，而是一個後者豐富前者的過程。現在我這篇文章已在一個學術公眾號上重新發表。這次出版我的碩士論文，也收入了這篇1982年的文章。後來本學科內關於青年馬克思、老年馬克思的議論有一些，但並沒有引起更多的關注，因為真正懂得馬克思早期或後來新聞傳播思想的人屈指可數，爭論不起來。

黃：列寧開始把報刊、輿論組織看成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及國家管治的一部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1905年在〈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中提到，寫作事業應當成為整個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分，成為由整個工人階級的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開動的一部巨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雖然你曾解釋，要上下文聯繫理解。但不管怎麼說，列寧把報刊或者輿論事業看成黨的事業的一部分，要為黨的主張和目標服務，這是無疑的。但馬克思又是怎麼看待報刊及廣義的傳媒和統治階級意識形態，以及同國家管治之間的關係？

陳：列寧沒有系統論述過「報刊、輿論組織是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及國家管治的一部分」，但1917年十月革命以後他的一些說法、做法似乎可以推导出這樣的結論，故後來蘇聯的御用文人根據列寧而延伸出來這樣的說法。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0期(2019)

馬克思把報刊視為社會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1844年7月，他與別人辯論的時候寫道：「我們先把『德國社會』這一名詞包括的各種範疇區分一下(我們的『普魯士人』就沒有這樣做)：政府、資產階級、報刊、最後還有工人們自己。這裡講的是不同的東西。」馬克思當時已經非常明確地談到報刊與當權者、與一定階級的聯繫，但他還是把報刊整體視為與政府、階級「不同的東西」。

19世紀中葉，歐洲主要國家的新聞業正在從黨報時期向商報時期轉變，因而那時報刊與政治的關係比較複雜。恩格斯1849年說：「在大國裡報紙都反映自己黨派的觀點，它永遠也不會違反自己黨派的利益；而這種情況也不會破壞論戰的自由，因為每一個派別，甚至是最進步的派別，都有自己的機關報。」這就是當時報刊與政治的關係，也是無產階級報刊可以生存的條件。而較多的研究文章引證這段話時，只引到分號為止，以說明報刊的階級性，顯然不熟悉當時的環境背景。

隨著報刊的逐漸商業化，馬恩對於同一家報刊的政治分析在不同情形下的定性會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例如評價《泰晤士報》，一會兒說它是某黨派或某屆政府的機關報，一會兒說它是純粹的商業企業，一會又說它是某位政治家的御用工具等等，因為報紙為自身的利益經常見風使舵，哪邊風大哪邊倒。也有沒有立場的報紙，例如馬克思分析過的發行量一度僅次於《泰晤士報》的英國《晨報》(*Morning Advertiser*, 1794–1934)。他寫道：「《晨報》進入每一家小酒店，甚至大部分客廳，所以這家報紙成為一家大報的物質基礎也就奠定了。然而，它之所以有影響應歸功於這樣一種情況，即報紙並不是經過編輯的，而是每一個論壇，每個讀者都可以在上面發表自己的意見。因為倫敦『有身份的』報人不許《晨報》加入自己的行列，認為它不夠資格，所以《晨報》為了對這些哥兒們進行報復，除了給自己的讀者外，有時也給那些不投靠任何黨派的較著名的作家騰出一些篇幅。」

那時瑞士、英國的政治體制基本是代議制，馬克思、恩格斯實際上領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報》(1879–1990)是在這兩個國

家自由出版、在德國國內秘密發行的；1848年革命時期普魯士萊茵省一度實行這種政治體制，《新萊茵報》也是自由出版的。恩格斯1890年回顧說：「我生平曾經有兩次榮幸地為報紙撰稿而完全得到了出版工作中一般所能有的兩個最有利的條件：第一，絕對的出版自由，第二，深信你的聽眾正是你想要同他們說話的人。」講的就是1848年革命時期的萊茵省和瑞士、英國的「最有利的條件」。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大女兒燕妮·馬克思說：英國是「眾所公認的出版界聖地」（文章均經馬克思審讀甚至是合寫的，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頁688）。

馬克思、恩格斯有這樣一個基本思想：「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一個國家的報刊、輿論組織會受到統治階級思想較大影響，但它們傳播的思想不能簡單的認為就是或只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兩者不完全是一回事。他們對這個論斷進行了一系列的具體論證。如果我們忘記了或不知道這些論證，用這個宏觀的論斷簡單地套用，說明各種具體的歷史與現實，就可能得出荒謬的結論。我在《精神交往論》第一章第五節專門論述了這個問題，談到七種情形說明這兩者之間關係的複雜性。由於種種具體的原因，統治階級中眼光短淺的部分可能會摧毀代表他們思想的報刊、排斥他們的思想代表，形成與馬克思、恩格斯的宏觀論斷相反的情形。

**黃：**你的敘述釐清了很多論斷式的似是而非的觀點，那麼列寧後來又是怎樣發展他的黨的報刊/出版物的觀點呢？我們又應該怎樣看待列寧提出的報刊三大功能「宣傳者」、「鼓動者」及「組織者」，尤其是對「組織者」的理解？

**陳：**列寧出生於沙皇俄國。19世紀60年代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自上而下地解放農奴，一度有限度地開放言論出版自由，俄國出現了一批著名的民主主義期刊和自由主義作家、思想家，列寧作為農奴的孫子和省教育廳長的兒子，接受到西方文化，是在這些期刊和作家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列寧成人之年，恰是俄國言論出版政策最為嚴峻之時，他寫道：「俄國的一切出版物、一切報刊，都處於奴隸的地位，得不到政府官員的許可，它們就不敢登載任何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0期（2019）

東西」，任何一種非官方許可的出版活動都被看成是政治罪而受到懲罰。因而出版自由是當時列寧奮鬥的目標之一，1896年他起草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綱表述是「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罷工和結社的絕對自由」。這一表述直到1917年6月他為黨的六大寫黨章草案，沒有改動過。

在20多年後的1917年9月，即十月革命前夕，列寧再次談到出版自由，他的定義是「出版自由就是全體公民可以自由發表一切意見」。十月革命勝利第二天，即11月9日，列寧簽署「蘇維埃政府關於查禁敵對報刊的法令」，他宣布：「本法令是臨時性法令，在公眾生活恢復正常後將被一項特別法令所取消。」「一旦新秩序得到鞏固，所有不利於報刊的行政措施都將廢止；根據這方面所規定的最廣泛最進步的規定，在對法律負責的範圍內，新聞將得到充分的自由。」這是列寧最後一次從法治角度談到出版自由。此後一周，列寧的新聞出版自由政策變成了全面剝奪原有報刊。此時，布爾什維克獲得政權僅九天。

列寧十月革命前反對書報檢查和爭取言論出版自由的認識，與馬克思沒有什麼不同。他的說法發生明顯變化的轉折點是十月革命（現在俄國官方叫「十月政變」）。

1917年11月17日，即十月革命勝利後的第九天，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討論列寧起草的「關於出版問題的決議」，決議決定設立一個委員會調查報刊和資本的關係，接收私人印刷所和庫存紙張，歸蘇維埃所有，至此出版自由開始以「階級」劃線。左派社會革命黨的委員和部分布爾什維克的委員反對這個決議，會議以34票對24票通過。大部分參會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因此事的分歧而宣布退出委員會，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的五位委員（共有委員24人）不同意「用政治恐怖手段來保持純粹的布爾什維克政府」，因「不能對這一政策負責」而退出委員會。他們是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前三位還是政治局委員）、米柳亭和諾根。後三位同時辭去他們在政府中擔任的內務、農業、工商人民委員職務。

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出版自由的設想簡單化了，以為只要用暴力將資產階級報紙及印刷所收歸國有，就能保障勞動人民完全

地、實際地獲得出版自由。他還一度錯誤地把報刊的市場化生產和經營看作是妨礙勞動人民實際獲得出版自由的障礙，好在他在有生之年糾正了這一錯誤。

列寧1905年的文章〈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涉及的是黨的出版物而非社會性出版物。黨的出版物自然是黨的事業的一部分，他對出版物黨性的論證是全面的。列寧寫東西很快，那幾天一口氣寫了多篇共計幾萬字的文章，這篇文章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映了當時黨內鬥爭而已。後世的蘇聯把這篇文章獨樹起來，研究文章多如牛毛，把關於黨的出版物的要求變成了國家控制所有出版物的原則。還有列寧關於《火星報》是集體的組織者的話，本來是特殊情形下《火星報》這張秘密報紙(газета, 單數)的任務，斯大林完全不顧歷史背景，要求後來蘇聯所有的印刷品(печатать, 相當於英文print)都成為組織者。印刷品只能起到宣傳者的作用，組織者在邏輯上說不通。黨才是組織者，精神產品沒有組織功能。

**黃：**馬克思認為《新萊茵報》是普魯士國家機器的一部分還是獨立的？馬克思認為他服務了12年的《紐約每日論壇報》，是屬於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生產者，還是商業社會提供信息的輿論載體？

**陳：**《新萊茵報》出版時期，包括普魯士王國在內的德國各邦國處於民主革命中，萊茵省實行代議民主制，使用《拿破侖法典》。該報的出版是自由的，不是普魯士王國國家機器的一部分。1849年馬克思在科隆陪審法庭上談到《新萊茵報》作用：「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社會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眼睛，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無處不在的喉舌。」1850年，他和恩格斯還寫道：「當報刊匿名發表文章的時候，它是廣泛的無名的社會輿論的工具；它是國家中的第三種權力……報紙是作為社會輿論的紙幣流通的。」他們同時也論述過，具體的商業媒體是不可能完全獨立的，會受到各種勢力的影響，包括政黨和商業利益的影響。

馬克思為之撰稿的《紐約每日論壇報》是19世紀中葉紐約四大報紙之一，他同意為其撰稿，有多種因素。該報老板是美籍德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0期(2019)

國人，傾向傅立葉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編《新萊茵報》時期，《論壇報》編輯部主任採訪過他並參加《新萊茵報》組織的公開集會；當時馬克思極度缺錢，需要獲得稿費收入；同時這也是在美國傳播自己的觀點的機會。馬克思與一般朋友談到該報，強調它在美國的社會影響力，發行量20萬等等；私下與恩格斯等密友經常罵它如何把他的文章去掉署名作為社論發表，如何拖欠或減少稿費或如何沒有眼光扣發了他的通訊。顯然，在馬克思眼裡，這是一家政治上與他不敵對的商業性報紙，似乎從未強調過該報的資產階級性質。

我在《精神交往論》書中有專門的章節談到報刊的種類與功能，翻來覆去想說明的是，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報刊性質的論述不是簡單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兩分法。報刊是以自己的利益為轉移的，怎麼對它有利，就怎麼與各種權力交往和說話，經常發生變化。但是，總體上它是「作為社會輿論的紙幣流通的」。

**黃：**你認為馬克思的報刊思想、新聞思想、傳播思想是否是成體系的？比如像他系統的哲學思想，系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還有列寧的新聞思想又如何呢？

**陳：**馬克思的傳播思想和關於報刊論述，嚴格說都不是系統的，需要研究者整理和有根據地加以論述。他有比較宏觀的認識，前面已經引證，也有更多的微觀論述，無法用簡單地一句話來概括。若要回答得滴水不漏，就需要很詳盡的材料，才能說得比較全面。

列寧是在既定前人「主義」基礎上說與做，研究列寧的思想，需要不斷地回過頭來對比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以及西歐國家，主要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報刊工作經驗對他的影響。列寧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時間(1900–1917)是在西方國家度過的，包括德國、英國、瑞士、法國、意大利、奧匈、瑞典、波蘭、芬蘭。這些國家被列寧稱為「自由國家」，在那裡獲得了在自己的祖國無法想像的廣泛的活動自由，特別是新聞出版自由和通訊自由。他追求精神自由、具有良好的個人民主作風，同時又具有遵循黨內活動慣例的「守法」意識，這些個人特徵主要是長期生活在自由國家養成的。

列寧思維敏捷，反應迅速，寫東西很快，具有組織者和鼓動家的天分；他很激動，對人對事的判斷容易偏激，但冷靜下來後對事對人的判斷較為寬容。他注意學習，這可以從他的讀書筆記中感覺到，但是工作繁忙使他難以長時間靜下來從理論上研究問題。因而，列寧的著作帶有論辯家的機智和滔滔不絕的鼓動色彩，不像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著作那樣嚴謹。研究列寧論著裡表達的黨報黨刊思想，不宜只就某個比喻、某個詞或半句話來反覆捉摸，而應從整體上來理解和把握。例如十月革命前他盛讚西方國家的政治自由，「在美國，自由是最充分的。」「英國是世界上最富有、最自由和最先進的國家之一。」十月革命後他的批判又不留有餘地，「只要資本還保持著對報刊的控制（在世界各國，民主制度與共和制度愈發展，這種控制也就表現得愈明顯，愈露骨，愈無恥，例如美國就是這樣），這種自由就是騙局。」「在全世界，凡是有資本家的地方，所謂出版自由就是收買報紙、收買作家的自由，就是買通、收買和炮制『輿論』幫助資產階級的自由。」列寧在某種意義上是政治人物，不是思想家。

**黃：你認為理解馬克思報刊思想、新聞思想、傳播思想的關鍵的命題有哪些？**

陳：宏觀的，我認為馬恩最重要的傳播觀是「世界交往」這個概念，這是他們觀察人類傳播現象的背景和基點。就報刊思想而言，馬克思的宏觀認識在於他提出了報刊有自己的內在規律。1843年初，他說：「要使報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須不從外部為它規定任何使命，必須承認它具有連植物也具有的那種通常為人們承認的東西，即承認它具有自己的內在規律，這些規律是它所不應該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擺脫的。」「內在規律」（innere Gesetz）處，馬克思加了著重號，顯然意在強調這一點，確認報刊有不同於其他領域的獨立的工作特點。

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思想中，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他對電報作用的認識——用時間消滅空間。1853年因一場大雪封路，倫敦人被迫使用比較昂貴的電報聯繫，隨後電報的使用普及，馬克思在南非英—荷文報紙《南非人報》上報道了這場大雪和電報的使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0期(2019)

用；1855年他進一步說：「電報已經把整個歐洲變成了一個證券交易所」。100多年後，麥克盧漢才用「地球村」、「部落村」重複並豐富了馬克思這個思想。

關於報刊的社會作用，馬克思早期論證過報刊如何能夠成為社會的「第三個因素」，實際上談到了報刊面對事實時所處的中立地位問題。馬克思(部分還有恩格斯)對新聞政策，特別是對書報檢查的批判，其邏輯力量令人難以駁倒；而他對新聞出版自由的法治化論證，也是很有力的。他提出了批駁書報檢查制度的八點論證(具體可見我的相關文章)。

馬克思關於新聞出版自由的法理研究也是頗為深刻的，他至少在四方面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研究：(1)新聞出版法不是預防性的，它不應與對象為敵，只是在對象偶然違法(例如誹謗)時才發揮作用。如果關於新聞出版的法律是預防性的，必然要將所有報道和意見假定為懷疑對象，等於扼殺了任何自由的交流。(2)這種法律必須與黨派的認同相區別。(3)新聞出版法的規定應當是明確的，而不是含糊的，法律用語的含糊會使得主觀任性得以為所欲為。(4)新聞出版案件的司法權獨立於行政權。

馬克思、恩格斯對「新聞」的認識，也是很深刻的。他們至少在五方面思考過新聞、新聞傳播的問題：(1)變動影響產生新聞，事實的變動是自然發生的，因而新聞並非均量產生，它存在淡季和旺季。(2)事實的變動永不停頓，因而新聞層出不窮，但是通常不大的事實變動產生的新聞居多數；一旦出現較重要的新聞，那些較小的事實變動便會被人們忽略。(3)人們的認識是以每代人的生命為期限的，在一定條件下，歷史對新一代來說可能會變成「新聞」；即使是新近變動的事實，從宏觀歷史的角度觀察問題，一定程度上它可能是歷史的再現。(4)由於事實變動在時間、空間的分布上是不均衡的，因而即使新的事實或行動還未開始，已經傳播過來的關於它們的新聞，會帶來一種信息势能，使當事的人們或感受到壓力或感受到鼓舞，並引發實際的變動。(5)市場經濟運作中「用時間消滅空間」的衝動，直接刺激著新聞傳播不斷地以快速的時效克服空間帶來的障礙。

**黃：**如此說來，馬克思、恩格斯的新聞傳播思想與列寧、斯大林等的新聞傳播思想是有所不同、甚至有不少對立的地方？

**陳：**嚴格說，列寧基本沒有新聞思想。他沒有寫過一篇新聞，他參與的黨報黨刊多達40多家，他發表的文章，短到幾百字（中譯文字數），長到數萬字，但都是政論。除了年輕時他在家鄉非黨的《薩馬拉新聞》發表過一篇文章外，他所有發表的文章都是在黨報黨刊（包括第二國際的黨報黨刊）上。當然，他是懂新聞的，因為要處理大量的工人運動通訊。列寧有豐富的黨報思想，對中國共產黨影響深遠。斯大林1912年以前是地方黨組織的領導人，參與過12家存在時間很短的地方黨的報刊工作，寫的也都是政論。由於他們是政黨領導人，因而很少談及新聞傳播思想。列寧晚年關注廣播的技術建設，主要是從廣播更有利於宣傳的角度考慮的。他關於廣播是不用紙張、沒有距離的報紙的比喻，其實是向後看，傳播觀上並不可取。在批判沙皇的書報檢查、爭取新聞出版自由方面，他與馬克思的觀點是一致的，只是遠不如馬克思那樣分析批判的深刻；斯大林這方面只有幾句批判的話。

在黨內思想交流方面，列寧具有相當開放的認識，與恩格斯晚年關於黨內思想交流的論述很接近。列寧在1906年就提出了「行動一致，批評自由」的原則，後來他總結說：「行動一致，討論和批評自由——這就是我們明確的看法……沒有討論和批評的自由，無產階級就不承認行動的一致。」為進一步保障黨內少數人發表意見的權利，列寧1910年起草並由黨中央全會通過創辦「爭論專刊」的決議。十月革命後，1920年9月，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會議通過創辦「爭論專刊」的決議。1921年3月，黨的十大再次通過由列寧提出的創辦「爭論專刊」的決議。他說：「如果你把所有不順從的聰明人都驅逐出去，只把忠順的白痴留下，那麼你必將把黨毀滅。」

列寧1924年逝世後，斯大林中止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當時出現的400多家民營報刊和出版社瞬間消失。他還中止了列寧確立的「爭論專刊」制度，其理由十分荒謬。1925年，他說：「我們禁止出版這種雜誌。現在他們想用『禁止』的字眼來嚇唬我們。但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0期（2019）

是，同志們，這算不了什麼。我們不是自由主義者。在我們看來，黨的利益高於形式上的民主。」「形式上的民主是空洞的，而黨的利益才是一切」。

1929年，斯大林幾經黨內鬥爭而獲得了政治上的控制權。1929年12月慶祝斯大林50歲生日，一位當時在聯共（布）中央機關工作的人後來回憶道：以前按照姓氏字母排序的政治局委員的名單，一下子改為將斯大林公開奉為列寧的第一個學生和唯一的黨的領袖。「《真理報》一帶頭，其他報紙也跟著來了。然後，雜誌、地方報紙、電台、電影、俱樂部、黨的整個宣傳機器都開動起來了，所有宣傳品都遵循一個標準：每篇文章開頭引用『領袖』話，結尾向他信誓旦旦地頂禮膜拜……沒有文化的哈薩克民間詩人江布爾……在《真理報》上簡單而形像地描述了斯大林：『斯大林比大洋還深，比喜馬拉雅山還高，比太陽還亮。他是全世界的導師！』」

到20世紀30年代末，斯大林把對思想文化的控制推向了高度集中化、行政命令絕對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充滿個人崇拜的教條主義理論，輿論一律，學術爭論和理論探索幾乎完全停滯。95.5%的人文社會科學團體、92.9%的文藝團體、69%的普通文化教育團體、48%的自然科學和技術學會停止活動。學術思想僵化，理論簡單化和教條化。通過打倒老一代學術文化權威和批判他們的理論，安插追隨斯大林個人的年輕幹部，使得這一體制通過組織系統得到加強。

這一體制也影響到共產國際，1937–1938年，十幾個國家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被逮捕和處決。中國共產黨也受到聯共（布）黨內鬥爭的影響，陳獨秀等一批黨的最早的領導人和黨員被打成「托派」。1937年以後的共產國際執委會內部，完全沒有了不同聲音，決議不再是討論的產物，只需執行而已。國際的報刊基本上成為單純刊登一系列決議和宣傳要點的載體，沒有任何問題的討論，斯大林「黨的利益高於形式上的民主」的思想，最終被貫徹到共產國際的領導機構和國際的報刊。

廖：是否可以認為斯大林的新聞觀念旨在進行意識形態控制？

陳：斯大林思想文化體制的特點是：確立對斯大林個人及其理論的崇拜，以其是非為是非，以其理論公式為衡量真理的惟一標準；肅清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包括一切中間的思想形態；以大批判、大鬥爭和肅整的手段管理學術文化；以隔離、封閉的方式在「純社會主義」的環境中培養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以壟斷的方法，通過以政治和哲學粗暴干預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方式，控制意識形態。這段歷史造成一種怎樣的情形，德國歷史學家丹尼爾斯做了一段精煉的概括：「發展到最後，人們只能聽到一種聲音，即無所不知的獨裁者的聲音。為了給獨裁者的每一個行動做辯解，人們任意給理論和歷史做新的解釋，這樣做的必然結果就是：理論變成了教條，精神生活完全制度化。」

黃：請進一步談談列寧開創的新聞報刊模式。

陳：關於新聞報刊模式，嚴格說是黨報模式，列寧依據俄國黨的特殊情況和俄國的環境，形成了一套適合這種環境的黨報體制。他豪邁地說：「給我們一個革命家組織，我們就能把俄國翻轉過來！」「他們沒有時間去考慮民主制的兒戲形式，但他們非常真切地感到自己的責任。」於是，職業革命家從責任感出發使黨報成爲一種思想的領導中心。但是，這種適合當時俄國鬥爭環境的體制一旦形成工作慣性，在環境變化的時候（黨的報刊變成國家的報刊）是難以轉變的。

列寧十月革命後竭力扭轉報紙的工作重心，希望轉到生產建設上來，直到逝世也沒有完全解決這個問題。他自己對於社會性報刊作用的理解受到自己常年生活和工作環境的影響，與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報刊社會作用的觀點相去較遠。

十月革命後的十天內，他的新聞出版政策從封閉幾家反對十月革命的報刊，迅速調整為調查、沒收所有資本家的報刊和印刷所。半年後，列寧又迅速實行軍事共產主義，取消商品交換，實際上取消貨幣，強迫全體居民實行勞動公社制度。報刊與此對應，從訂閱制變為分配制，列寧認為是向共產主義邁進了一步。他要求報刊的報道以生產建設為中心是對的，但他當時關於蘇維埃辦刊作用的認識，明顯背離報刊的基本職能。他寫道：「讓我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0期(2019)

們把報刊上那些報道所謂日常新聞的材料減少到1/10(如能減少到1/100更好)，而讓那些向全體居民介紹我國少數先進的勞動公社的模範事跡的報刊廣泛銷行幾十萬幾百萬份吧！」把報紙的新聞壓縮到百分之一，這還是新聞紙嗎？

1921年，列寧承認犯了重大錯誤，停止軍事共產主義，實行新經濟政策，部分恢復了報刊報道新聞的職能，並堅持黨的機關報可以刊登廣告。由於身體原因，他可能意識到存在的問題，但已經無力改變。例如1923年1月23日列寧口述了具有改革思維的〈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一文，要求馬上發表。斯大林則提出讓政治局討論，結果決定推遲發表。黨的第三書記古比雪夫建議印刷一期專為給列寧看的《真理報》，讓患病的列寧看到他的文章已經發表。這種事情，1916年的中國「皇帝」袁世凱的手下人就做過一次，為的是讓洪憲皇帝看到太平的天下而特意出版一張只供他一個人看的報紙。

上世紀80年代中國新聞學界曾有「斯大林新聞模式」一說。內容包括：(1)建立在「新型無產階級政黨」理論基礎上的關於中央委員會機關報體制的思想。馬恩時期的黨報是「全黨的機關報」，列寧時期轉變為「中央委員會機關報」。列寧的改變適應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鬥爭的環境，保障黨的方針政策能夠在秘密狀態下通過黨的報刊正確傳達到基層。但1919年後，這一俄國的黨報體制無一例外地推廣到第三國際的所有共產黨內，作為一種固定的黨報模式，就可能出現問題。(2)新聞工作者必須遵守「鐵的紀律」的觀念。這本來是列寧1920年提出的，當時東歐各國正在發生革命或戰爭。列寧要求實行像軍事紀律那樣的鐵的紀律，黨中央必須擁有最廣泛的權力，黨報必須無條件地服從中央的領導等等。但到斯大林時期變成了對黨報工作者的常規要求，這在和平時期便容易發生問題。(3)黨報的作用便被限定在政治需要的範疇內，凡不適於宣傳需要的新聞，便不是適於發表的新聞，於是宣傳等同於新聞的意識不斷得到鞏固。以上這些思想認識在一定的歷史環境下是合理的，問題在於當環境發生變化時，黨領導的新聞工作在體制、認識和管理機制方面應當與時俱進。



斯大林新聞模式是從列寧開始的，但列寧本人較好的民主作風使這個模式的缺陷沒有彰顯到嚴重程度。隨著馬克思主義傳播到比較落後的地區，其缺陷逐步顯露。主要三個原因：(1) 普遍的專制制度迫使那裡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能公開運用民主的方式和言論出版自由進行鬥爭，為了黨的秘密存在，在黨內也不能很好地實行民主制度。(2) 他們生活在這種專制環境中，反動派有效的專制手段是他們唯一的治國的參照系，這使得他們產生一種從相反方向對獨裁效應的向往，幻想著一旦指揮棒從敵人手裡轉到自己手中，就可以立即實現共產主義理想。(3) 那裡的人民群眾普遍缺乏民主意識，更沒有實際參與民主制的實踐，一定程度的領袖獨裁和單向的宣傳鼓動適於動員群眾。

**黃：**列寧、斯大林以及毛澤東等都是國家的掌權者/領袖，他們對於報刊/媒介功能的解讀與定性與作為資本世界批判者的馬克思、恩格斯的解讀/定性主要的不同之處在哪裡？由此是否產生了兩種思路及路徑取向？

**陳：**列寧、斯大林以及毛澤東等的新聞宣傳活動主要是在黨內的媒體，毛澤東與社會性媒體還有一些聯繫，列寧和斯大林對這些社會性媒體完全沒有體驗，而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工作，一定程度上是新聞工作者，所以他們關於報刊一般社會功能的認識是較為深刻的。列寧、斯大林以及毛澤東等都有掌握國家政權的經歷，把原有的社會的媒體基本消滅，將黨的媒體轉變為新政權下的社會性媒體，於是原來的黨報體制基本上成為國家媒體的體制，自然關於媒體社會功能的認識是建立在原來對黨報作用的認識基礎上的。

1956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曾有過一次對黨報功能認識的調整，進行了改版。改版社論寫道：「《人民日報》是黨的報紙，也是人民的報紙」，「我們的報紙名字叫『人民日報』，意思就是說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財產。人民群眾是它的主人。」毛澤東批准發表該社論。中共中央於8月1日發出第124號文件，批轉《人民日報》給中央的改版報告。文件指出：「中央批准這個報告，認為《人民日報》改進工作的辦法是可行的。中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0期(2019)

央還希望各地黨委所屬的報紙也能夠進行同樣的檢查，以改進報紙的工作。」「我們黨的各種報紙，都是人民群眾的報紙，它們應該發表黨的指示，同時盡量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如果片面強調它們是黨的機關報，反而容易在宣傳上處於被動地位。」由於後來黨的指導思想後來發生「左」傾錯誤，這次改版無疾而終。

**黃：**到了現在，一些人提馬克思的時候，特別忌諱他提反對書報檢查，言說自由。他們採取的方法基本上是兩個，一是乾脆不提，二是用列寧的報刊思想來把它統稱，把它描述成馬列主義的報刊思想。能不能從廣泛的角度再給我們梳理一下？

**陳：**可能有一些知道的人會有所忌諱，但我感覺大多數人可能都不知道。我曾組織本科生在「元典讀書」課寫馬克思〈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書評三篇，發表在《青年記者》在2011年8月號。書評作者之一蘭青同學因為讀的是馬克思的書(具體是哪本沒人關注)，隨後採訪她的鏡頭上了《新聞聯播》。這三篇書評收入2016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陳力丹帶你讀新聞傳播學經典》一書第一組。我還組織人大新聞學院講師劉宏宇寫馬克思這篇文章的考證論文，發表於2011年的《國際新聞界》。但在論述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時候，除了我總是一開始就提及馬克思的這些觀點，沒有看到誰在講這些。關於黨性說得很多，只能從列寧說起，因為馬克思沒有說過。

**廖：**在當今中國新聞學、傳播學研究中，有關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一部分列寧的新聞觀念的研究，佔多大的份量？

**陳：**我估計名義上佔很大比重，但真正研究馬新觀的人並不多，這是需要研究積澱的，不是說是個人就能研究起來的。近期參加某大學召開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研討會，只有不到兩成的發言涉及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研究(包括對習近平宣傳觀的研究)。其他的發言，都是先說幾句要研究和學習馬克思主義，隨後講的便與馬新觀無關了。有一部分本學科的馬工程專家，其實沒有這方面的任何積澱，但他們是「專家」，審查別人是不是「馬主義」。

**黃：**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研究有什麼進展？有什麼問題？這些問題會對今後研究帶來什麼影響？



陳：進展是有了多得翻不完的書和看不完的文章，而且還在以幾何級數增長。如果不是參與審讀，我不會看的，因為大多數是垃圾（只有少數文章是有水平的）；那些下指令要求寫書和文章的人，自己也不會看。但是這些作者可以評職稱評獎，所在單位可以獲得很多經費，在評估中得到較高評價；安排這項工作的領導們，也可以作為政績得到提升。多數這方面的成果，空話和政治套話太多，哪句話比較時髦就跟著說哪句，然後就是如何偉大，如何堅決貫徹學習，就這種思路。

廖：現在中國關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新聞觀念研究當中，很多是通過二手資料來研究的，沒有查閱馬恩及列寧原著，這樣的研究方式會帶來什麼影響呢？

陳：二手資料是不大可靠的。例如我收到過一篇來稿，研究恩格斯〈反杜林論〉使用「傳播」的概念，分析得頭頭是道，但恩格斯使用多少次「傳播」的數據竟是根據中譯文統計出來的。中譯文裡的「傳播」概念，對應的恩格斯原文是多個不同的德文單詞，還有個別的英文、法文單詞。不查看原著文字，這樣的「研究」就是學術垃圾。再如我們常說的列寧的「灌輸理論」，我在1981年就查對過，這是翻譯為中文後造成的誤讀。首先，這不是列寧的思想，而是列寧是根據考茨基的論述做了進一步的論證。第二，不論考茨基的德文還是列寧的俄文，根本沒有一個對應的動詞「灌輸」，而是一個介詞詞組。現在一些馬新觀的研究文章，習慣於從馬列中譯文找可以解釋現實政治用語的詞句，按照官方既定的理解來解釋，而不考慮原意是什麼。例如我看到2016年一篇省級黨報關於新聞黨性人民性的萬字理論文章，說最早提到「黨性」的是恩格斯，作者引證的譯文是一個動賓結構的詞組「沒有黨性」，而對應原文只是一個單詞，應該翻譯為「中立」或「不偏不倚」，翻譯為「沒有黨性」是錯譯。作者還引用馬克思一處中譯文裡有「人民性」的話並加以肯定，連中譯文都沒有看懂，這句話恰恰是馬克思批評的觀點！如此的研究，都是根據二手譯文，這對馬新觀的研究無疑是一種傷害。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0期(2019)

再如，至今中國本學科學者關於《新萊茵報》的研究文章無數，都是以馬克思、恩格斯發表在該報上的文章(不到全報文章的一成)的中譯文進行「研究」，幾乎沒有一個人真的看過《新萊茵報》，這是有些滑稽的事情。1981年，我做碩士論文的時候研究《萊茵報》和《新萊茵報》，就意識到這個問題。但我那時不懂德語，自費函授學習德語也來不及用上。在懂德語的研究生同學幫助下，我比對過幾處馬克思原文與中譯文，就感覺到必須要以原始材料和原文字為基礎，才能真正進入研究狀態。我的最終目標是翻譯整個《新萊茵報》(301期正刊及經常有的增刊和幾十期號外)，估計1,200萬中文字的翻譯量，得十年時間吧。我只能開個頭，以後要找接班人繼續做。

2018年，我主編了一本厚厚的書《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百科全書》，盡可能把研究建立在一手材料上，糾正了部分以往研究中的誤讀或對資料的誤判，大家認為做得很好。以後是否繼續有人以這樣的治學態度來研究，誰來做這種默默無聞且花費力氣的工作？我不知道。如果沒有這樣的研究基礎，馬新觀的研究將缺乏必要的學理基礎。

**廖：** 那您覺得中國馬克思新聞思想研究的發展前景、趨勢會是怎樣？

**陳：** 如果作為一項學術研究，還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的。如果作為現實政治話題，現在的情形不容樂觀，從很多原有的套話裡推理出新的套話，是基本做法，做表面文章的太多了。這種寫文章的思路本身，違反毛澤東1945年提出的黨的三大作風(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繫群眾、批評自我批評)的要求。學術研究與政治不可能完全脫離，但不能政治化，畢竟不是一回事。至於研究的發展前景，現在要求必須以習近平2016年5月17日關於社會科學的講話為依據。他說：「要加快完善對哲學社會科學具有支撐作用的學科，如哲學、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民族學、新聞學、人口學、宗教學、心理學等，打造具有中國特色和普遍意義的學科體系。」

**黃：** 對於新的一代馬克思新聞傳播思想的研究者，你對他們有什麼忠告？

對話陳力丹：馬克思主義新聞學

陳：我認為首先要在基本史實的基礎上做研究，如果連忠於史實都做不到，那樣的研究沒有任何學術價值。包括研究馬克思，也包括研究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新聞傳播思想和政策。

現在常說不忘「初心」，「初心」就是歷史。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內容很多，並不止現在所說的八點。例如關於中國共產黨傳播政策的初心，最早的也是很權威的應該是1922年9月13日創刊的黨的第一家正式機關刊物《向導》的發刊詞。這篇文章代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喊出了「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我們可以溫習一下這段論述：「十餘年來的中國，產業也開始發達了，人口也漸漸集中到都市了，因此，至少在沿海沿鐵路交通便利的市民，若工人，若學生，若新聞記者，若著作家，若工商家，若政黨，對於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宗教信仰，這幾項自由，已經是生活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了。在共和國的名義之下，國家若不給人民這幾項自由，依政治進化的自然律，人民必須以革命的手段取得之，因為這幾項自由是我們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可是現在的狀況，我們的自由，不但在事實上為軍閥剝奪淨盡，而且在法律上為袁世凱私造的治安警察條例所束縛，所以我們一般國民尤其是全國市民，對於這幾項生活必需的自由，斷然要有誓死必爭的決心。『不自由毋寧死』這句話，只有感覺到這幾項自由的確是生活必需品才有意義。」這裡實際上是用中國的語言和在中國的情境下，較為全面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關於新社會傳播政策的內容，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

### 陳力丹教授著作選

陳力丹(1993、2008、2016)。《精神交往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北京：開明出版社(初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三版)。

陳力丹(1999、2012)。《輿論學：輿論導向研究》。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初版)、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二版)。

陳力丹(2002、2007、2016)。《世界新聞傳播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陳力丹(2002)。《馬克思主義新聞學詞典》。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陳力丹(2003)。《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概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0期(2019)

陳力丹(2006)。《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思想體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陳力丹(2008)。《新聞理論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陳力丹(2009、2017)。《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新聞》。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

陳力丹(2009)。《不能忘卻的1978-1985年我國新聞傳播學過刊》。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

## 本文引用格式

陳力丹、黃煜、廖雪婷(2019)。〈對話陳力丹：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傳播與社會學刊》，第50期，頁1-26。